



文化与教育 的双重历史变奏

——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



周洪宇◎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

——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

周洪宇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周洪宇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609-7219-0

I. 文… II. 周… III. ①文化史-中国-文集 ②教育史-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②G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8242 号

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

周洪宇 著

策划编辑:周小方

责任校对:祝 菲

责任编辑:刘 烨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 插页:2

字 数:59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reface

本书是笔者文化教育史研究方面的论集,也是继 2007 年给安徽教育出版社《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丛书》编辑出版个人教育理论研究方面成果《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 2008 年给武汉出版社编辑出版个人教育政策研究方面成果《教育的信念与追求》之后编辑出版的个人文化教育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它与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教育家文库》的个人综合性文集《教育的历史、理论与政策》以及上述两种书一道,四种书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由专到博、由分到合的研究系列,大致反映了个人在教育历史、教育理论、教育政策三方面的所思所想与学术追求,也真实地体现了笔者 1982 年大学毕业以来在教育研究上的奋斗历程和思想轨迹。与年龄的递增呈正相关状,由于时间的积淀加上理性的思考,个人不仅在生理年龄上已由弱冠之年步入知天命之年,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完成了从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理想主义者到务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自觉转变。

本书收录了笔者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文化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文化史研究篇,包括文化史研究总论、文化史人物个案研究、文化思潮与运动史研究,下篇是教育史研究篇,包括教育史总论,教育史人物个案研究,教育制度、改革、运动思潮、机构、群体史研究,合起来共二十九个单元,基本涵盖了个人三十年来文化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与成果。笔者自学术起步始,就十分明确,文化与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尽管现象上和研究中各有畛域,但本体实质同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化是教育的本源、基础、内容与精髓,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手段与途径,两者相互含蕴、渗透与影响,密不可分。而且,从广义上说,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从未将文化史研究与教育史研究截然两分,视为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而是力求做到在文化史宽广而深厚的背景下开展教育史研究,通过教育史的研究反映和体现文化史的内容。书中的文化史人物陶行知个案研究单元,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尝试。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公认的大教育家,但他何尝不是 20 世纪文化巨擘中的佼佼者? 他的信仰、文化理念、文化创造与人格精神,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史极为难得的宝贵财富? 笔者二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就没有局限在教育史的范围研究陶行知,而是尽量在文化史的背景下和视野里,突出陶在 20 世纪文化创造方面的巨大贡





献,将陶行知判定为“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而不单纯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笔者将本书定名为“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正是基于文化史与教育史的密切关系。遗憾的是,由于笔者资质鲁钝,学力不足,在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的结合上成绩并不尽如人意,距理想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唯一能聊以自慰的是,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知我罪我,也只能一任诸君了。

三十年来,在教育史研究方面,笔者稍感欣慰的是,没有坐井观天、墨守成规,而是力求在教育史学理论及其运用上有所突破。笔者试图在国际历史学与教育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思考国际教育史学与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将出现“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三大转向,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史学观,即学科性质史学论(教育史学虽为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但更多历史学成分,而少教育学成分)、研究对象三分论(研究对象并非原有的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还应包括教育活动史,教育活动史是更为本源、更为基础的教育史组成部分,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加强研究)、研究重心下移论(由上层精英转移到民间大众)、理论方法现代论(理论与方法应该与时俱进,应构建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层次组成的系统方法论)、学科功能双重论(存史、释史、寻真、积累的学术功能与资政、助教、育人的社会功能)、学术传统继承论(注重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编撰体裁等方面的优良传统)、学术表述规范化(史料运用规范化、编撰类例规范化、编撰程序规范化、语言表述规范化)、教育史分期三段论(教育史分期不同于社会史分期,应是原始教育、古代教育、现代教育,而非原来照搬照套而来的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封建社会教育、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学者素养要素论(学者须具备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四者,且顺序不能颠倒)、未来发展多元论(史学理论的多元化、史学方法的多元化、研究对象的多元化、成果形式的多元化)。笔者还立足于学科建设的长远目标,进一步拓展了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与领域,指出应在原有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更为本源、更为基础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因为从三者的关系来看,教育活动是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都是教育活动的结果。没有人的教育活动,就不可能有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产生。同理,教育活动史是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教育活动史就没有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以往忽视教育活动史研究,只注重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将教育活动史混杂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中,无形中消解和取缔了教育活动史及其研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以致“只见物不见人”,“只见思不见行”,这无疑是过去教育史研究方面极大的缺陷和不足,也是长期以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大多流于平面和肤浅,无法形成立体多层动态研究,难以真正深入、取得实质进展的根源所在。笔者主张的教育活动史研究与原有研究不同,倡导追求全景式总体史的研究宗旨,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以问题研究的导向为研究取向,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视情而定的理论与方法论,以及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方式。笔者在即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和主编的“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以及正在牵头编撰并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和《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将对教育活动史研究做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开拓领域,转换范式,形成流派,发展学术,这是笔者及同仁未来的共同追求和奋斗目标。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同行,加入到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队伍,共同为发展祖国的学术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笔者拜时代所赐,有幸成为“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以后第一批大学生,尤其有幸的是

起步之时就能够追随史学大师章开沅先生和教育史专家董宝良教授等人研习历史,并始终与一班学生朝夕相处,答疑辩难,相互切磋,教学相长。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蕴含着师长们的心血和学生们的帮助,蕴含着学术界同仁的指点和家人的鼓励。其中,有些篇章还是师生们合作探讨的产物。笔者愿意把这本论集看做对大家的初步汇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战斗正未有穷期”,在今后的岁月里,笔者将继续努力,争取以更加成熟的研究成果,向大家再次做系统汇报。

在论集出版之际,笔者首先要对专注学术、不计成本出版本书的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先生和编辑周小方女士表示衷心感谢,没有他们的热情约稿,就不会有这本论集的出版;其次也要对论文原载刊物及编辑表示感谢,对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协助我整理、校对本书的张建东博士表示感谢;最后还要对长期与我共同探讨、合作研究的师生们表示感谢,这里面也凝聚着大家许多的心血和智慧,它是在学术旅程上共同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历史见证。

周浩宇

2010年9月教师节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前言



·

·

·

·

·

·

·

·

III



上篇 文化史研究篇

第一章 文化史研究总论·····3	
第一节 关于文化学研究的几个问题·····3	
一、文化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3	
二、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及其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位置·····6	
三、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10	
第二节 文化系统论纲·····13	
一、文化学研究与系统方法·····13	
二、文化系统的要素分析·····15	
三、文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17	
四、文化系统的发展问题·····19	
第三节 法定节假日应增加传统文化节日内容·····20	
一、法定节假日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20	
二、为了多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应丰富国家节假日的历史文化内涵·····21	
三、国家应适时调整节假日,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2	
第二章 文化史人物陶行知个案研究·····23	
第一节 陶行知的人生选择·····23	
一、陶行知的人生三部曲·····23	
二、陶行知的人生选择·····37	
三、陶行知的教育生涯·····40	
第二节 陶行知的宗教信仰·····49	
一、陶行知信仰基督教义的原因分析·····50	
二、陶行知对基督教义的排拒·····51	
三、陶行知对基督教义的接纳·····53	



- 第三节 陶行知的文化理念……55
 - 一、文化思想的渊源及演变……56
 - 二、文化思想的形成及特质……58
 - 三、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62
- 第四节 陶行知的文化创造……65
 - 一、创立大众教育的事业与理论……65
 - 二、开创一代文艺新风……75
 - 三、普及现代科学……100
 - 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110
 - 五、推动新图书馆运动……122
- 第五节 陶行知的人格精神……126
 - 一、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127
 - 二、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127
 - 三、炽烈真诚的教育激情……128
 - 四、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128
 - 五、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128
 - 六、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129

第三章 文化思潮与运动史研究……130

- 第一节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的转轨……130
 - 一、启蒙狂飙突进……130
 - 二、提倡民主与科学……131
 - 三、打倒吃人的礼教……132
 - 四、倡导个性解放……133
 - 五、揭橥“文学革命”主张……134
 - 六、文化论战迭起……135
- 第二节 近现代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136
 - 一、东西文化的差异……136
 - 二、新旧文化能否调和……139
- 第三节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142
 - 一、学说主义纷呈……145
 - 二、中国人的抉择……149
 - 三、思想冲突中的抉择……154

下篇 教育史研究篇

第四章 教育史研究总论……163

- 第一节 关于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163
 - 一、学科性质史学论……163
 - 二、研究对象三分论……168
 - 三、研究重心下移论……170
 - 四、理论方法现代论……172
 - 五、学科功能双重论……173



六、学术传统继承论·····	175
七、学术表述规范论·····	177
八、教育史分期三段论·····	178
九、学者素养要素论·····	180
十、未来发展多元论·····	182
第二节 教育史学发展的历史与思考·····	183
一、教育史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历史学的内在渊源·····	183
二、《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的思考与追求·····	192
第三节 全球视野下的教育史学新走向·····	194
一、多元化:文化史观给教育史学的启示·····	194
二、整体化:西方史学对教育史学的牵引·····	196
三、群体化:教育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197
四、民间化:教育本性对教育史学的呼唤·····	198
第四节 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	199
一、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	200
二、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	202
三、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	204
第五节 教育史学改革管抒·····	208
一、更新思想观念·····	209
二、开阔学术视野·····	209
三、完善知识结构·····	210
四、拓宽研究领域·····	210
五、深化研究内容·····	211
六、改进研究方法·····	212
第六节 教育活动史研究综论·····	213
一、追求全景式总体史的研究宗旨·····	213
二、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	215
三、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取向·····	217
四、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	218
五、“视情而定”的理论与方法论·····	221
六、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形式·····	222
第七节 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	223
一、视野下移:社会科学共同认可的研究取向·····	224
二、教育活动史:教育史学的原始构成板块·····	225
三、研究重心:着眼于各类教育的日常活动·····	226
第八节 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是教育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29
一、明确定位,坚定方向·····	229
二、总结反思,提高素质·····	231
三、加强团结,精诚合作·····	233
第五章 教育史人物个案研究·····	234
第一节 论朱元璋的皇子教育·····	234
一、重视“恤民”政治教育·····	235



- 二、特别强调“德性”修养……236
- 三、积极引导实习“政事”……238
- 四、以“法”治家严格要求……239
- 第二节 杨贤江笔名考……242
 - 一、“李宏君”考……242
 - 二、“李仁民”考……244
 - 三、“姚宝贤”考……246
 - 四、“郑绍康”考……247
 - 五、余论……248
- 第三节 杜威政治态度新析……248
 - 一、杜威是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维护者吗？……248
 - 二、杜威别有用心反对中国青年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吗？……250
 - 三、杜威一贯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吗？……251
- 第四节 教育与和平——从牧口常三郎到池田大作……252
 - 一、相似的人生历程……252
 - 二、共同的教育理想……258
 - 三、相通的和平思想……263
- 第六章 教育制度、改革、运动思潮、机构、群体史研究……268
 - 第一节 我国考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268
 - 一、我国考选追求区域公平的历史……268
 - 二、中国现代高考制度的内在缺憾……272
 - 三、重点高校录取名额合理投放的建议……273
 - 第二节 论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276
 - 一、组建教育部，开启新教育改革的大门……276
 - 二、拟定教育宗旨，确立新教育改革的方向与目标……278
 - 三、公布新学制，调整教育体系与结构……279
 - 四、颁布课程标准，进行课程改革……279
 - 五、出台政策，推动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280
 - 六、注重立法，确保教育改革与发展得到法律保障……282
 - 七、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改革中做到了有所作为……283
 - 第三节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284
 - 一、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内容及特征……284
 - 二、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规律与经验……287
 - 三、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教训及启示……290
 - 第四节 论生活教育思潮……293
 - 一、生活教育思潮的形成与发展……294
 - 二、生活教育派的基本主张……298
 - 三、政府派的生活教育主张……305
 - 四、教育界其他人士的生活教育主张……307
 - 五、生活教育思潮的影响与评价……310
 - 第五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现代教育……315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交流的历史背景·····	315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交流的历史过程·····	316
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贡献·····	323
四、结语·····	326
第六节 留美归国教育家对中国现代本土教育理论的探索·····	328
一、陶行知对杜威教育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328
二、陈鹤琴对杜威教育理论的接受与改造·····	330
三、邰爽秋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借鉴与创新·····	332
四、庄泽宣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吸收与反思·····	334
主要参考文献·····	337



上篇

文化史研究篇

SHANGPIAN

WENHUASHI YANJIU

第一章

文化史研究总论

第二章

文化史人物陶行知个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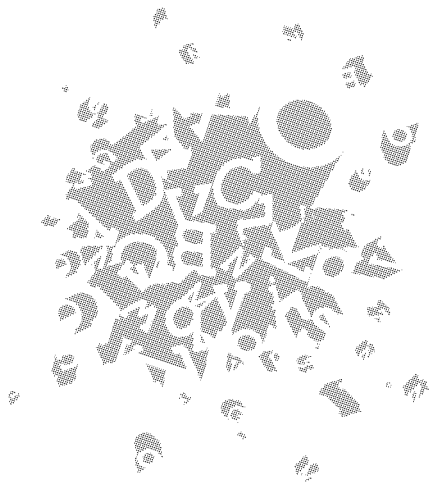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文化思潮与运动史研究



第一章

文化史研究总论



第一节 关于文化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文化——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词语。

文化——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20 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急速发展,文化研究遂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股世界性文化浪潮。文化学就是在这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一门专门研究文化的新兴学科。

文化学(英文 *culturology*, 法文 *culturologie*, 德文 *kulturologie*), 亦称文化科学。目前,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致力于文化学的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我国学者黄文山、陈序经等人曾做过探索性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种原因,文化学在国内几成绝学,仅港台等地尚有一些学者仍在继续探索。随着我国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文化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学的创建也随之成为一项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进行的工作。此节拟就文化学的历史、对象和理论等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文化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 ▽ ▽

研究任何学科,都要了解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唯其如此,才能知道其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研究对象、性质、作用和发展前途。

文化为人类与生俱来之物。人类对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思考由来久矣。仅以我国为例,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活动。《易·系辞传》中有:“古者庖牺氏之王

* 该节系笔者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化学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部分内容曾以本节同名刊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化研究》1988 年第 1 期首篇全文转载,又作为新时期代表性观点收入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三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这可以被认为是古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一种假说。不仅如此,“文”、“文化”、“文明”等字样也很早就已出现。如《尚书·序》曰:“由是文籍生焉。”《尚书·舜典》曰:“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易·贲卦·象》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曰:“凡武之为,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文化现象的种种认识。此外,在许多古籍里,诸如《周易》、《吕氏春秋》、《史记》和《文心雕龙》等,不仅记述了大量的文化现象,还隐含着一种极为可贵的文化通观。从某种意义上,可视它们为文化化学研究的滥觞。

追溯人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我们不妨驰骋神思于遥远的过去。但应指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文化学是在近代西方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萌芽和建立两个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文化学的萌芽阶段。文化学原本脱胎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其基本概念和理论大多采借于这些学科。因此,考察文化学的历史,必须先考察这三门学科对于文化的研究。

社会学系19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孔德所创。其代表人物还有英国的斯宾塞和德国的迪尔凯姆、韦伯等人。他们大多赞同社会进化学说,肯定文化发展的普遍性,提倡对作为社会规范的文化作实证研究,并认为社会是“超有机体”。这些主张对后来的文化学家们影响甚深。

文化人类学(亦称民族学)对文化(尤其是落后民族文化)也做了具体入微的探讨,且成绩斐然。该学科内学派林立,五花八门。大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有以美国的摩尔根和英国的泰勒等为代表的古典进化学派,以德国的格雷布纳、奥地利的施密特和英国的史密斯等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以美国的鲍亚士和克鲁伯等为代表的历史批判学派,以英国的马凌诺夫斯基和布朗等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出现了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和以怀特为代表的新进化学派等。这些学派运用不同方法对文化做了许多经验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概念,如“文化圈”、“文化层”、“文化区域”、“文化结构”、“文化模式”、“文化变迁”等,它们多为文化学家所借鉴和采纳。特别是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科学”(science of culture)一词,并为文化下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这在英语世界中是最早的。

由素喜漫游于精神世界的德国学者所倡导的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在文化研究上所作的贡献,较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毫不逊色。列维-皮格亨早在1838年就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克莱姆于1843年著《普通文化史》,1854年著《普通文化学》,均以倡建文化学为宗旨。此外,李凯尔特认为“精神科学”即“文化科学”,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均提出了“文明类型”的概念,这些都对文化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在对文化所做的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建立文化学理论体系,为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了尝试。曾获诺贝尔奖的德国化学家奥斯瓦尔德,于1909年发表《文化学的能学基础》,提出了“文化学”(kulturologie)一词。1915年,他在美国做“科学的体系”的讲演时,把科学加以分类,并将文化学置于现代科学的顶端。由于奥斯瓦尔德是一位化学家,故其建议未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足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黄文山也是文化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20世纪30年代即发表文化学的有关论著,创建文化学,惜因著述全为中文,长期未能为中文世界之外的学者所知晓,影响难免有限。奠定现代文化学理论基石的是美国学者克鲁伯。他与克鲁克洪一道提出了文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影响极为深广。他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



内隐的行为模式,它们借符号之使用而被学到或被传授,而且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观念,尤其是其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的进一步活动之因素。另一位美国学者怀特也是创建文化学的有功之臣。他于1949年著《文化的科学》,又于1963年著《文化进化》。其学术思想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颇深,他主张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文化。有的学者称他为“文化学之父”,把他与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孔德相提并论。近年来,西方文化学发展甚快,已产生了政治文化学、经济文化学、生态文化学、心理文化学、工程文化学等分支,逐渐形成一个“文化科学群落”,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与之相呼应,近20年来,文化学在苏联和东欧各国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这门学科不仅得到了这些国家学术界的公认,而且产生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学家(如卡尔波夫、马尔卡梁和亚·泰纳谢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化、文明、传统、文化系统等基本概念,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且富有成效的探讨。

尽管中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源远流长,但文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出现,却是近代以来的事,并与近代两次文化研究热潮有着直接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远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便已有了接触。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化挟雷霆之势,澎湃而东,与中国文化相激相荡,相拒相吸,蔚成巨观。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对中国的现状从文化上进行反思,并着手从事中西文化比较。从戊戌维新始,中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20世纪30年代止,形成了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在这次热潮中,有些学者不满于某些论者对中西文化妄作评鹭或单是从文化史研究中寻求未来的前途,而试图从文化基本原理求得透解,遂有文化学兴建之举。国内学者最先提出“文化学”一词的,据笔者所知,似为李大钊。他在1924年《史学要论》中列表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其中的特殊历史学,又分理论与记述二部。理论之部,指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的综合,当称为人文学或文化学。尽管他此处所说的“文化学”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学尚有出入,但其首议之功,殊不可没。两年之后,张申府也在《文明或文化》一文中使用了“文化学”一词。继之而起的黄文山、陈序经、阎焕文等人,更是这门新学科的热心鼓吹者。梁漱溟、朱谦之、钱穆等人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文化理论多有论列。一批文化学的论著随之问世,如黄文山的《文化学论文集》、《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阎焕文的《文化学》,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论》,等等。它们为文化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顺便指出,上述论著的文化观多带有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这是我们应当仔细鉴别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学在内地中断多年,唯有港台地区一批学者仍在这片园地上矻矻劳作,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如钱穆的《文化学大义》、余英时的《文明论衡》、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等。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一个文化研究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许多报刊开辟专栏刊载论文,报道有关情况,许多出版机构开始组织出版文化及文化史专著、译著。各种文化史讲习班、研讨会也极为活跃,影响较大的就有十余次。尤为可喜的是,若干有识之士开始把主攻方向转向文化学的研究,期冀通过文化学基本理论的探讨,来推动文化史和中外比较文化研究向纵深拓展。文化学在中国的真正建立,已指日可待。

文化学能在今日兴建,实非偶然,其原因约有以下数端: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需要,现代科学总体化发展的要求,学术探讨自由气氛的形成,世界性文化研究浪潮的冲击,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高扬。文化学在今日兴建一事本身就显示了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从



理论意义上看,文化学将通过对文化的性质、特征、内容、形式、结构、功能、类型和变迁等基本问题的探讨,揭示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丰富人们对文化基本理论的认识。文化学还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将提高文化史和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水平,也将开拓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从现实意义上看,普及文化学的知识,能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占有核心地位,文化的选择无非是人的选择,使人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吸取外来文化的菁华,从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学还将推动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在考察文化学的历史时,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学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学思想既是近代人类社会文化理论发展的宝贵结晶,又是今天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体系的历史起点。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思想?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在持否定态度的人中,除了个别人是出于其偏见,大多数人恐怕还是缺乏了解。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一本写有“文化学”字样的理论专著,甚至也没有使用“文化学”一词,但他们曾对文化问题做过深入探讨,他们的著作里包含有文化学的丰富内容。我们可以说他们尚未建立完整的文化学理论体系,但不可以说他们连文化学的基本思想都没有。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恐怕就不会有这种误解了。

被誉为“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的马克思,在其光辉的战斗生涯里,为了检验、修正并丰富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曾对当时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做过广泛的阅读和摘要,并在这些摘要中表明了自己对文化问题的见解。他从1868年开始读毛勒的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治权的历史概论》,1876年读毛勒的《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同时又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的土地制度》;在逝世前的1879—1881年期间,他又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著作。近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45卷收入了他的四个文化人类学笔记,这是他在逝世前阅读时写下的摘要和评语。他曾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结构进行了改造,计划就此做进一步的论述。但是,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他就溘然长逝了。此后,由恩格斯“执行遗嘱”,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晚年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系统表述,于此书可见其详。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对文化问题有科学的论述,其中既有原则性的理论分析,也有具体的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些论著中有关文化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建立一门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及其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了解它的性质,明确它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研究文化学也不例外。但是,在目前国内文化学刚刚起步的情况下,要想对之作出严密的科学表述,则是很困难的。这里,笔者只是试图尽自己的最大努